

编者按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战略部署下,国家体育总局近期印发了《合作共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导向。资源配置作为竞技体育系统运行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我国竞技体育优势巩固与可持续发展。当前,面对竞技体育综合效益不高、内生动力不足等困境,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已成为深化竞技体育改革的关键议题。研究基于2013—2022年全国面板数据,运用全局参比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系统测度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揭示其总体水平不高、增速不快的现状,并从政府与市场维度剖析效率困境的深层成因。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目标任务属性—市场化程度”分类改革思路,针对不同运动项目分别设计差异化投入方式,并提出具体实施策略,以期深化竞技体育体制机制改革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困境与改革路径

张瑞林,王禹,王志文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资源配置的改革调整,直接决定着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优势巩固与瓶颈破解。采用全局参比的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对2013—2022年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测度发现,总体效率水平不高且增速缓慢。结合实地调研和专家访谈,分析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存在着政府主导下的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递减、市场机制在竞技体育资源配置中作用发挥不充分的效率困境。基于此,设计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的分类化改革思路,依据不同项目的目标任务属性与市场化程度,提出多元化运动项目投入方式。对于为国争光—市场充分项目,选择政府与市场协同合作方式;对于为国争光—市场薄弱项目,选择政府主导—市场配合方式;对于常规目标—市场薄弱项目,选择政府兜底—市场自主方式;对于常规目标—市场充分项目,选择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方式,并提出针对性地实施策略。

【关键词】:体育强国;新型举国体制;竞技体育;资源配置;运动项目

【中图分类号】: G8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5)04-0001-12

DOI: 10.15877/j.cnki.nsic.0250902.00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决策部署,为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建设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国体制一直贯穿于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在推动奥运争光战略、展示国家体育软实力、服务社会多元需求等方面取得辉煌成就,极大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强调要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强。竞技体育是实现体育强国的重要动力引擎,其整体

实力稳步提升,在历届奥运会中取得了骄人成绩,推动我国跻身世界体育大国、奥运强国之列。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但稳定运行多年的举国体制综合效益不高、内生动力不足、资源聚合能力不强等困境也开始显现^[1-2],制约着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为更好

收稿日期:2025-05-31

基金项目:国家体育总局决策咨询研究重大项目(2025-A-16)。

第一作者:张瑞林,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管理与体育产业。

地适应新型举国体制建设需要,亟待改革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机制,设计科学化资源配置改革路径。鉴于此,研究遵循“基本现状—问题剖析—实施策略”逻辑,通过对新时代以来(2013—2022年)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测度揭示基本现状,深入剖析资源配置面临的效率困境,创新性提出竞技体育资源配置的改革路径,旨在最大限度释放竞技体育发展的外部正效应,增强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1 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的效率测度

1.1 研究设计

1.1.1 模型设定

Tone^[3]提出的SBM模型既能科学处理非期望产出,又可拓展为超效率模型而进一步区分有效单元。然而,该模型基于各时点的截面数据构造生产

可能性集,不同时期的生产可能性集存在差异,每一个时期所构造的生产前沿面是变动的,导致不同时期的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无法进行跨期比较。为此,Pastor等^[4]提出全局参比思路,构建整体DMU的最佳效率前沿面作为效率测度基准,实现不同时期各地区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的跨期和逐期对比。因此,参考既有研究^[5],结合全局参比、非期望产出、超效率和SBM模型,构造了GB-US-S-SBM模型,用于竞技体育资源的配置效率测算。具体而言:将竞技体育资源配置系统作为决策单元,假设共有 $T(t=1, \dots, T)$ 个时期与 N 个决策单位(DMU),每个DMU利用 m 种投入可生产出 s_1 种期望产出和 s_2 种非期望产出。对于第 k 个DMU _{k} ,其投入、期望产出及非期望产出向量分别记为 x_k^T 、 $y_k^{g,T}$ 和 $y_k^{b,T}$ 。在规模报酬不变(CRS)的假设条件下,构造的生产可能性集见式(1),GB-US-S-SBM模型见式(2)~(7):

$$P = \left\{ (\bar{x}, \bar{y}^g, \bar{y}^b) \mid \bar{x}^T \geq \sum_{\tau=1}^T \sum_{\substack{j=1 \\ j \neq k \text{ if } \tau=t}}^N \lambda_j^\tau x_j^\tau; \bar{y}^{g,T} \leq \sum_{\tau=1}^T \sum_{\substack{j=1 \\ j \neq k \text{ if } \tau=t}}^N \lambda_j^\tau y_j^{g,\tau}; \bar{y}^{b,T} \geq \sum_{\tau=1}^T \sum_{\substack{j=1 \\ j \neq k \text{ if } \tau=t}}^N \lambda_j^\tau y_j^{b,\tau}, \lambda \geq 0 \right\} \quad (1)$$

$$p_k^{G^*,t} = \min \frac{1 + \frac{1}{m} \sum_{i=1}^m \frac{S_{ik}^t}{x_{ik}^t}}{1 - \frac{1}{s_1 + s_2} \left(\sum_{r=1}^{s_1} \frac{S_{rk}^{g,t}}{y_{rk}^{g,t}} + \sum_{q=1}^{s_2} \frac{S_{qk}^{b,t}}{y_{qk}^{b,t}} \right)} \quad (2)$$

$$s.t. x_k^t - \sum_{\substack{j=1 \\ j \neq k \text{ if } \tau=t}}^N \sum_{\tau=1}^T \lambda_j^\tau x_j^\tau + s_k^t \geq 0 \quad (3)$$

$$\sum_{\substack{j=1 \\ j \neq k \text{ if } \tau=t}}^N \sum_{\tau=1}^T \lambda_j^\tau y_j^{g,\tau} - y_k^{g,t} + s_k^{g,t} \geq 0 \quad (4)$$

$$y_k^{b,t} - \sum_{\substack{j=1 \\ j \neq k \text{ if } \tau=t}}^N \sum_{\tau=1}^T \lambda_j^\tau y_j^{b,\tau} + s_k^{b,t} \geq 0 \quad (5)$$

$$1 - \frac{1}{s_1 + s_2} \left(\sum_{r=1}^{s_1} \frac{S_{rk}^{g,t}}{y_{rk}^{g,t}} + \sum_{q=1}^{s_2} \frac{S_{qk}^{b,t}}{y_{qk}^{b,t}} \right) \geq 0 \quad (6)$$

$$\lambda_j^\tau \geq 0, s_k^t \geq 0, s_k^{g,t} \geq 0, s_k^{b,t} \geq 0 \quad (7)$$

式中, $p_k^{G^*,t}$ 表示目标函数值,即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 x_k^t 、 $y_k^{g,t}$ 和 $y_k^{b,t}$ 依次为 t 时期DMU _{k} 的投入、期望产出及非期望产出; b 、 g 分别表示坏和好; x_k^τ 、 $y_k^{g,\tau}$ 、 $y_k^{b,\tau}$ 和 λ_j^τ 依次为 τ 时期DMU _{j} 的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和权重向量; s_{ik}^t 、 $s_{rk}^{g,t}$ 和 $s_{qk}^{b,t}$ 依次为 τ 时期DMU _{j} 的第 i 种投入、第 r 种期望产出和第 q 种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

1.1.2 指标选取

资源配置理论的核心在于探讨资源在各种可能的用途之间进行分配的方式和规律,以达到最优的经济和社会效果。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重点围绕人力、财力、组织等核心要素展开,竞技体育的规模扩大、结构优化、效益提升、动力增强更多依靠核心要素实现。“投入产出”理论是基于整体与拆分相

结合的视角,在一定时期内各级政府及其他主体的运作,“投入”一定资金、生产材料与劳动力,获得相应的产品、资金与效益的“产出”,即经济系统的良好运行取决于资源要素投入和生产成果产出的均衡发展^[6]。据此,将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的内涵界定为竞技体育系统中人力、财力、组织等要素投入与人才、成绩等成果产出在空间上的综合映射,其本质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要素投入和最小化的沉没成本损失为代价来获得最大化的竞技体育产出效益。

既有研究在投入指标层面,主要考虑了人力、财力和组织等要素投入^[7-8];在产出指标层面,将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数作为期望产出是当前较为常见的做法^[9]。上述测度指标虽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可并被广泛应用,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财力投入多以财政拨款替代,实际上忽略了体育彩票公益金在竞技体育训练、后备人才选拔和设施装备支持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二是对非期望产出测度指标考虑尚不全面,在广度和精度方面均存在不足。基于此,研究在充分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聚焦新时代竞技体育资源配置的政策目标,并依据指标的代表性与数据的可得性,确定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的测度指标(表1)。

表1 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衡量指标

Tab.1 Measurement indicators for efficiency of competitive sports resource allocation in China

指标类型	指标构成	具体指标	单位
投入	组织投入	各级运动项目管理部门数	个
		各类竞技体校数	个
	人力投入	各级运动项目管理人员数	人
		各类运动项目教练员人数	人
	财力投入	竞技体育财政支出额	万元
		体育彩票公益金用于竞技体育投入额	万元
期望产出	人才队伍	各类运动项目运动员发展人数	人
		各类运动项目后备人才数	人
	竞技水平	运动员获世界冠军人数	人
非期望产出	沉没成本	各类运动项目优秀运动员淘汰率	%

具体而言,投入指标包括组织投入、人力投入、财力投入。其中,组织投入包括各级运动项目管理部门数和各类竞技体校数(涵盖单项体育运动学校、本科院校、体育运动学校、业余体校、体育中学、其他

体校等),是竞技体育资源配置的组织载体。人力投入包括各级运动项目管理人员数和各类运动项目教练员数^[10],是竞技体育资源配置的重要主体。财力投入包括竞技体育财政支出额(含运动项目管理、体育竞赛、体育训练等)和体育彩票公益金用于竞技体育投入额(含体育竞赛、运动员保障、体育训练等)^[11],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保障。期望产出指标包括人才队伍和竞技水平。其中,人才队伍包括各类运动项目运动员发展人数和各类运动项目后备人才数,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表征。参照一般做法^[12],将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人数表征为竞技水平。非期望产出指标将沉没成本纳入其中,参考已有研究的计算方法^[13],将各类运动项目一个周期内被淘汰的优秀运动员人数与运动员总数的比例,用来衡量各类运动项目优秀运动员淘汰率。

决策单元DMU的生产过程满足等张性假设是运用超效率SBM模型进行效率测度的前提,即增加任意一个DMU的投入量,则其产出量也必须相应增加或至少不能减少,皮尔逊相关系数是检验投入产出等张性的常用方法。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竞技体育资源投入产出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所有DMU的生产过程满足等张性要求。

1.1.3 数据来源及处理

竞技体育资源投入产出数据来自历年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统计年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编制的《体育事业统计年鉴》,财政部综合司编制的《中国彩票年鉴》,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对于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因统计年鉴所得样本数据具有一定的时期滞后性,故将研究时段设定为2013—2022年。由于统计口径和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因,研究对象不包括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运动员获世界冠军人数指标数据来自国家体育总局官网(<https://www.sport.gov.cn/>)。为确保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真实性,课题组结合前期实地调研掌握的信息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全面核查,又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官方网站发布的竞技体育相关数据进行了比对与验证。最终形成一组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个年份的面板数据集。

1.2 实证结果

1.2.1 竞技体育资源投入规模与产出规模基本呈现扩张趋势

通过对比我国竞技体育资源投入产出数据,可以发现在考察期内竞技体育财政支出、体育彩票公益金、运动项目后备人才数、运动项目运动员发展人数、运动项目教练员数、运动项目管理人员数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其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42%、7.03%、4.55%、2.79%、1.29%、0.79%,其他指标呈现波动式发展趋势。这得益于:一方面,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推动我国竞技体育砥砺奋进、勇攀高峰的制胜法宝,通过组织动员和调配全国各方面的优势体育资源和力量为奥运争光战略服务^[14],体现了高度集中的国家意志、资源整合能力、系统风险控制等方面。这一优势不仅保障了竞技体育资源投入规模的持续扩张,更通过资

源转化效能的显著提升,促进竞技水平、人才梯队建设与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另一方面,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三十三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表示,我国能够跻身世界体育大国、奥运强国之列,根本在于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为体育竞技训练提供了先进科技支撑和坚实物质保障,也为各领域体育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成长环境和广泛群众基础。现阶段经济实力的空前跃升强化了竞技体育财政保障能力,科技能力的进步驱动了运动训练科学化水平,国际地位的提升拓展了国际性体育赛事承办空间等,为竞技体育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分配提供了坚实保障。

1.2.2 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水平总体不高且增速缓慢

由表2可知,2013—2022年,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各年份平均资源配

表2 2013—2022年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测度结果

Tab.2 Measurement results of efficiency of competitive sports resource allocation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2												
省份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均值	年均增长率/%
重庆	1.101	1.036	0.729	0.778	0.811	1.059	1.239	1.059	1.011	0.661	0.948	-5.51
四川	1.035	1.015	1.001	1.066	0.779	0.462	0.797	1.004	0.179	1.002	0.834	-0.36
广东	1.152	0.370	0.779	0.308	1.175	0.433	0.556	1.098	1.037	1.019	0.793	-1.35
上海	1.075	0.674	0.492	0.588	0.366	0.544	0.560	1.011	1.005	0.596	0.691	-6.34
浙江	1.115	0.365	0.463	0.454	0.491	0.547	0.533	0.594	0.832	1.118	0.651	0.03
北京	0.399	0.474	0.366	0.449	0.504	1.006	0.686	0.573	1.019	0.667	0.614	5.88
宁夏	0.288	0.315	0.454	0.466	0.236	0.357	0.479	1.078	1.068	1.007	0.575	14.92
青海	0.156	0.185	0.238	0.261	0.320	0.720	0.329	1.052	1.127	1.065	0.545	23.79
安徽	0.006	0.300	0.387	0.400	0.177	0.409	0.364	1.029	1.011	1.019	0.510	76.92
广西	1.058	0.387	1.012	0.351	0.241	0.256	0.217	0.527	0.581	0.381	0.501	-10.73
河北	1.013	0.337	0.166	0.232	0.155	0.280	0.360	0.571	1.074	0.145	0.433	-19.43
山东	0.530	0.304	0.396	0.348	0.473	0.220	1.011	0.212	0.216	0.236	0.395	-8.6
湖北	0.372	1.025	0.332	0.278	0.115	0.261	0.305	0.356	0.316	0.511	0.387	3.59
湖南	0.356	0.371	0.388	0.225	0.058	0.223	0.234	0.334	0.410	1.035	0.363	12.59
福建	0.257	0.336	0.404	0.293	0.186	0.349	0.613	0.569	0.325	0.234	0.357	-1.04
吉林	0.255	0.270	0.308	0.324	1.010	0.176	0.409	0.266	0.154	0.271	0.344	0.68
河南	1.015	0.278	0.225	0.199	0.181	0.299	0.367	0.357	0.105	0.108	0.313	-22.04
甘肃	1.028	0.049	0.032	0.090	0.113	0.119	0.123	0.119	1.048	0.182	0.290	-17.5
辽宁	0.371	0.193	0.312	0.266	0.226	0.321	0.380	0.283	0.147	0.302	0.280	-2.26
江苏	0.191	0.332	0.253	0.321	0.417	0.156	0.290	0.314	0.239	0.216	0.273	1.38

续表 2

省份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均值	年均增长率/%
山西	0.507	0.525	0.299	0.179	0.174	0.205	0.203	0.154	0.139	0.298	0.268	-5.73
内蒙古	0.137	0.054	0.027	0.011	0.046	0.069	0.034	0.020	1.060	1.019	0.248	24.98
天津	0.193	0.207	0.159	0.286	0.171	0.223	0.266	0.288	0.279	0.197	0.227	0.23
陕西	0.332	0.226	0.301	0.250	0.242	0.164	0.133	0.158	0.147	0.257	0.221	-2.81
新疆	0.087	0.146	0.124	0.041	0.075	0.126	0.110	0.124	0.112	1.023	0.197	31.5
黑龙江	0.214	0.138	0.145	0.128	0.193	0.171	0.177	0.146	0.145	0.291	0.175	3.47
海南	0.188	0.087	0.035	0.128	0.147	0.134	0.177	0.258	0.233	0.067	0.145	-10.83
江西	0.002	0.100	0.090	0.150	0.134	0.136	0.374	0.298	0.075	0.089	0.145	52.46
贵州	0.076	0.138	0.111	0.063	0.090	0.098	0.186	0.270	0.169	0.219	0.142	12.48
云南	0.063	0.102	0.072	0.114	0.147	0.107	0.108	0.127	0.083	0.038	0.096	-5.46
西藏	0.072	0.067	0.138	0.054	0.045	0.014	0.008	0.006	0.006	0.005	0.042	-25.65
全国	0.472	0.336	0.330	0.294	0.306	0.311	0.375	0.460	0.495	0.493	0.387	0.47

置效率基本处在0.5以下。由此可见,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存在资源投入过量、非期望产出过多和资源配置不当所导致的效率损失,距离生产前沿面还有较大差距。关于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政府体育主管部门以行政垄断的方式配置竞技体育行业资源,使得我国竞技体育行业难以达到最小有效规模,从而出现了行业规模不经济的情况^[15]。但其主要原因是存在资源配置上的路径依赖,主要通过国家主导下的要素投入实现资源配置,尤其是以为国争光为轴心的奥运战略

强调资源集中投入的粗放型发展,竞技体育资源转化不充分,单位资源投入竞技体育的产出率不高,实现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16]。箱线图(图1)反映了考察期内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的分布特征变化,其中位数处于0.2~0.4之间,极值年际差异显著,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形变化态势。2013—2016年,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迅速降低,由2013年的0.472跌至2016年的0.294,举国体制运行效能递减是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下降14.66%的重要原因。2017—202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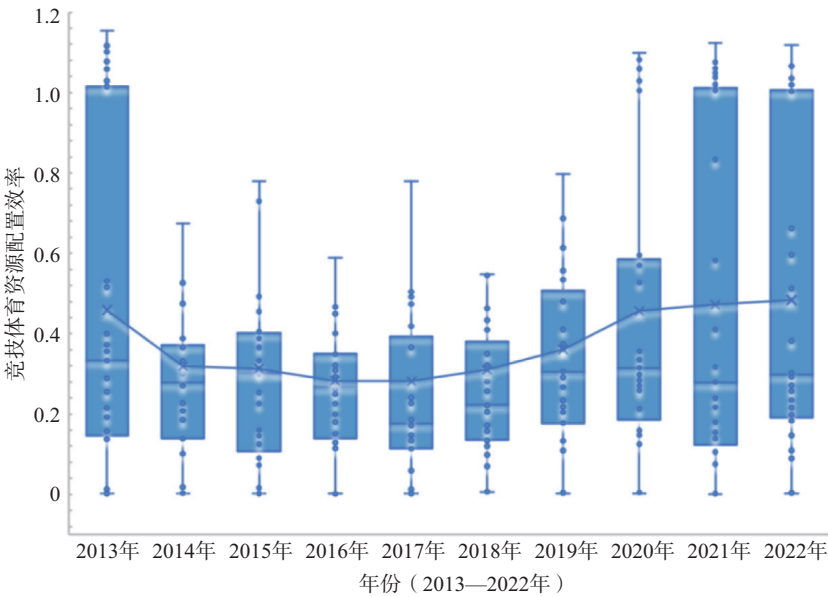


图1 2013—2022年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箱线图

Fig.1 Box plot of efficiency in alloc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resourc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2

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稳步提升,但增长幅度较小(9.02%)。在此阶段,政府部门提出要推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并出台了《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配置工作的指导意见》《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组织管理办法》等,政策的引导与实施促进了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

2 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困境

基于前文对实证结果的研判,结合实地调研和专家访谈,从政府和市场两个维度深层次分析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困境,识别掣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

2.1 政府主导下的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益减弱

2.1.1 政府竞技体育发展观念滞后

竞技体育观是对竞技体育的总体认知与观念体系的统称,揭示了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规律。当前,体育行政部门的竞技体育发展观念滞后,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受金牌至上的政绩观驱使。以金牌换政绩、以金牌论英雄、以金牌量为主导的传统思维下,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在奥运争光计划的贯彻中,过度追求金牌数量和依赖金牌考核的积弊,产生全运会“东道主定律”、运动员年龄造假、裁判员选拔寻租等问题。集体与单项项目的金牌在地方政绩考核中被等量齐观,但两者投入成本与社会效益悬殊,且举重、跆拳道、体操等单项项目潜在金牌产出率更高。二是成本效益观念不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存在着重“结果”轻“过程”、重“速度”轻“质量”的倾向,以粗放式发展实现我国竞技运动项目的快速发展,在特定时期取得了“从无到有”的成就,但其背后存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低效益的不良状态,不重视资源投入成本和代价的现象普遍存在,逐渐脱离成本收益约束^[17]。

2.1.2 行政壁垒阻碍资源流动

政府是我国竞技体育治理结构中的主导者,是竞技体育管理职能的主要承载者与竞技体育行政管理权力的核心执行者,掌控着经费、设施、人才、赛事及技术等优质资源配置。竞技体育资源流动局限于竞技体育体制内部,缺乏与外部资源的开放对接渠道,行政壁垒仍是阻碍行业、区域间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重要藩篱,大量资源沉淀、闲置在单一的行政系

统内,造成了严重的资源错配与浪费。一般而言,不同运动项目在开展选材时,存在区域保护主义壁垒和区域限制流动等问题。同时,单项体育协会垄断赛事资源,存在隐形门槛限制。我国单项体育协会负责赛事分级认证、赛事组织与管理等内容,其垄断着优质的赛事资源,尤其是赛事举办权仍被相关协会掌控,难以实现公平、公正、公开交易。

2.1.3 政府配置资源方式单一

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发挥效能的机制主要依托政府部门,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从上至下对竞技体育资源配置进行全能型控制,使其在短时间内集中有限资源实现跨越式、赶超型发展,形成偏态式发展方式,致使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18]。以行政主导的资源集中配置方式难以精准匹配不同项目的动态发展规律,相对成熟项目可能面临资源冗余与边际效益递减,而亟待培育的新兴项目或技术门槛高的项目却因资源供给不足难以突破瓶颈。例如,举重、体操、跳水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长期依赖政府投入,致使资金、人才等资源存在利用效率偏低、边际效益递减等问题,影响竞技体育整体效益最大化。政府单一供给方式虽然保障了运动项目发展稳定性,但也造成了资源分配机制僵化,难以适应新时代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2.2 市场机制在竞技体育资源配置中作用发挥不充分

2.2.1 缺乏市场机制运行的制度保障

当前,市场在竞技体育资源配置中作用发挥的制度设计不完善。《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提到,要推动运动项目、运动队、青少年赛事等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进程,但在实际运作中,市场主体介入时往往会面临准入壁垒高、资源获取难、体制机制约束多等问题,难以遵循市场化运作规律。在政府与市场合作机制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规范,政府与市场存在责权关系不清、利益分配不均等治理失序问题,短期内我国竞技体育内部利益整合机制还不健全,在资源配置中市场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抑制了市场参与活力。在市场投资回报和经济效益方面,社会资本因无法获得稳定预期回报而投资意愿低下,职业联赛版权价值、俱乐部盈利能力普遍羸弱,形成“投入高、产出低”的恶性循环,使资源配置难以实现经济

效益最大化。

2.2.2 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尚未形成

传统竞技体育依赖的政府单一主导模式,与市场经济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存在冲突,由于缺乏社会与市场主体的深度融入与持续投入,加之竞技体育的高门槛特性,进一步削弱了其自我“造血”能力和内部驱动力。同时,多元主体在参与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权责利界限模糊,制约了社会和市场协同治理效能的发挥,使得市场在竞技体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难以有效彰显,“管办不分”的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产业化趋势背道而驰,短期内竞技体育运行机制尚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投入的需要。例如,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在我国虽已形成一定市场化基础,但核心资源仍主要依赖行政主导,市场机制未能充分优化配置效率,制约了社会资本参与活力,导致项目发展潜力尚未完全释放。又如,我国的足球、篮球等项目资源配置方式长期与项目发展实际脱节,自20世纪90年代初推动体育职业化改革以来,项目发展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导致竞技成绩下滑。近年来,行政力量开始介入项目资源配置的机制还不成熟,尚未形成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机制^[19]。

2.2.3 体育产权权属界定不清晰

就实践而言,竞技体育产权的权属界定存在诸多痛点和堵点。在我国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的核心资源(如运动员人力资本、国家队品牌、赛事IP等),其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的归属往往模糊不清。这些资源虽由国家投入培养和打造,但在法律和制度层面缺乏清晰的产权界定^[20]。如个别明星运动员由于产权界定模糊,在个人商业价值开发、利益分配等方面与国家队立场产生分歧,最终导致其提前退役。足球、篮球等集体性联赛项目,运动员产权受到俱乐部、体育行政部门等多主体协商共享,导致产权界定不清晰,市场主体会因担忧投资安全性与收益可持续性望而却步或半途而废,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难以发挥。

3 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的改革路径

3.1 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的改革思路

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改革,要以提升效率为目标,推动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益优先”、

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生式发展”,促进体育资源向竞技体育表现转化效能的最大化。理论和实践表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通过竞争机制、价格信号和供求关系,能够有效激发活力、优化资源流向、提升投资效益,弥补行政主导下的竞技体育资源错配与效率不高问题。然而,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实现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与效益最大化需要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政府应聚焦战略引领、制度供给与市场失灵的矫正,发挥市场在运动员流转、商业赛事运营、无形资产开发等方面作用和优势,形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调机制。当前,在我国正式开展的运动项目有一百余个,但不同运动项目的社会基础差异巨大,所形成的市场规模也存在较大差距。不同的社会基础,决定了项目的商业价值,更影响社会和市场力量投资兴办该类项目的积极性。因而,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并非全盘市场化,而应考虑不同运动项目发展的状况,按照竞技体育资源的特点,分项目、分步骤地推动赛事举办权、运动员产权等竞技体育资源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

进一步明确运动项目分类的问题,一方面,以奥运争光为首要任务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向不能偏离,承担奥运争光任务项目对国家财政的依赖度一般较大,不同项目承担的任务属性不同,获取国家资源支持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不同运动项目市场化水平存在差异,市场化基础决定了项目资源按照市场机制配置的范围与程度。由此,按照目标任务属性和市场化程度两个维度,对运动项目类型进行划分,形成了4类项目,即为国争光—市场充分项目、为国争光—市场薄弱项目、常规目标—市场充分项目、常规目标—市场薄弱项目(图2)。具体到项目范围,为国争光—市场充分项目主要集中在部分传统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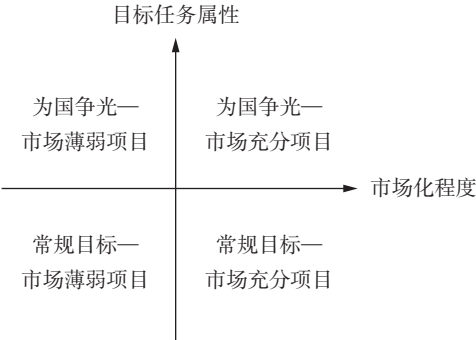


图2 运动项目投入的分类标准

Fig.2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investment in sports projects

势项目(乒乓球、羽毛球),基础大项,三大球项目等;为国争光—市场薄弱项目主要集中在部分传统优势项目如体操、举重、跳水、射击等;常规目标—市场薄弱项目主要集中在无争光压力且国内开展有限的部分奥运项目如垒球、曲棍球等;常规目标—市场充分项目主要集中在无争光压力但市场化水平高的部分奥运项目如马术、高尔夫球等。

3.2 运动项目投入方式的选择

3.2.1 对于为国争光—市场充分项目,选择政府与市场协同合作方式

在奥运争光战略的目标追求下,政府主导了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组织架构,全国体育系统内形成了以竞技体育工作为重心的多层级体制^[21],并构建了与之相适应的人、财、物等资源配置体系。政府部门作为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责部门,能有效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调配和集中公共财政资源,支持奥运争光战略实施。与此同时,运动项目市场化水平较高,具有较为丰富的市场吸引力,带来充足的市场资源支持,这种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此时,应当将举国体制的公共资源吸纳优势与市场机制的灵活高效优势相结合,实施政府与市场合理分工,推动共管共治合力,实现资源共同投入与利益回报共享,形成利益互契和均衡格局。由此,提出建立政府与市场协同合作方式。政府要明确市场化合作方向,降低市场主体进入竞技体育领域的门槛,拓宽社会投资竞技体育的空间。并设计双方共同投入制度,明确双方在赛事运营、人才培养、产业发展、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权责划分,形成奥运争光与产业发展互益的制度体系。考虑到部分项目具有职业化特征,要打通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的资源流通渠道,形成相应的竞赛、备战、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机制,吸纳市场主体积极融入国家任务承担体系之中。总之,通过政府与市场协同合作方式建设,推动市场机制深度嵌入举国体制,提升各部门主体间发展合力,形成平等化的互补关系。

3.2.2 对于为国争光—市场薄弱项目,选择政府主导—市场配合方式

由于奥运争光任务的历史发展使然,国家包办的公共资源投入方式推动我国竞技体育实现跨越式发展。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对于在国际赛场上争金夺银“好用且管用”,过去形成的“全国一盘棋”资源调

配优势还需进一步保持。同时,该类项目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市场化水平也偏低,行业内所具有的市场资源相对薄弱,市场投入的利润效益很难保证,使得市场机制作用发挥比较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力量还不足以支撑奥运争光任务实施,仍需依靠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来弥补市场难以自发关注支持的不足。但是,也应当认识到市场机制在生产和配置竞技体育公共产品上的优势功能。留出一定资源空间,推动市场成为举国体制可持续运转的有益补充,提升举国体制资源投入效率。其中,政府主导是有限的,如在推动竞技体育成果全民共享和市场化开发中,需要依靠市场力量进行资源运作,促进竞技体育部门资源效益最大化。市场主体依靠竞争机制、利益机制和志愿机制,遵循市场供需规律、围绕训练、赛事等内容生产竞技体育产品服务^[22],丰富产品供给结构,服务政府主动配置竞技体育资源大局。总之,通过政府主导下市场机制补充,既维系行政部门奥运争光利益诉求,又发挥了市场主体的积极作用,科学解决政府配置资源方式单一、行政性配置手段较多的问题。

3.2.3 对于常规目标—市场薄弱项目,选择政府兜底—市场自主方式

该类项目的奥运争光优势相对较小,并未纳入重点支持体系,项目资源集中度不高,所能获得的国家公共资源投入也较为有限。同时,该类项目在国内开展范围有限,区域发展基础和水平不均,市场化基础较为薄弱,难以获得充分的市场资金、资源支持。在此情况下,坚持发挥政府的兜底作用,对市场力量薄弱、市场支持不够的项目给予兜底性保障。特别是在涉及项目备战、训练、参赛等核心事务方面给予一定资金资源支持,通过参赛补贴、成绩奖励、组织扶持等手段,鼓励多方投入,扩大项目发展范围。应根据国际奥委会调整增设奥运会项目的情况以及我国项目发展水平动态变化,及时调整政府支持的范围及策略。此外,考虑不同项目资源配置的受益差距,可根据发展实际情况建立项目间的二次分配机制,以作为对弱势奥运项目的资源支持补充。市场力量则采取自主形式,完全按照市场机制,通过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自主形成项目资源配置方式。总之,在不影响国家奥运争光战略计划整体布局的情况下,由政府实行托底性保障,发挥市场主体积极

性,共同完成项目资源配置。

3.2.4 对于常规目标—市场充分项目,选择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方式

该类项目不在国家奥运战略重点支持范围内,但又具备着较充分的市场基础,拥有相对集中的市场资源,市场主体力量发展较为健全。对此,政府力量退却的同时,给予市场力量更多的自主运作空间,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方式。这种方式不再依赖于政府全权投入,政府也不再对项目资源进行直接配置,而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项目发展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立足政府引导性作用,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不可或缺的功能和作用,通过规划政策、标准制定、提供服务等方式,充分激活市场机制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作用。政府的引导性主要体现在:一是调动市场主体投资发展竞技体育的积极性,保障市场主体的正当收益;二是协调市场机制与国家任务之间的利益冲突,保证奥运战略稳定实现;三是保障市场主体参与竞技体育专业性事务,提供技术支撑;四是防止市场投机和恶性竞争,维护竞技体育要素市场秩序。同时,进一步拓展项目中竞争性配置的资源范围,围绕办队权、办赛权、运动员产权等内容,通过价格、供求和竞争等市场机制按需配置,不断形成项目领域要素交易市场。总之,在政府引导下强调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既有利于项目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又能为竞技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带来充分市场收益。

3.3 运动项目投入方式的实施

3.3.1 “政府市场协同合作”方式的实施策略

第一,建立前期市场主责与后期政府支持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破解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前期投入风险高、后期收益不确定的困局,关键在于构建风险共担与收益共享的协同机制。前期阶段,激发市场活力,建立风险共担机制。政府应采取设立青少年体育发展基金、提供税收优惠或信贷担保等方式,撬动企业等社会资本早期介入具有潜力苗子的选拔与培训过程,分担家庭、学校等培养单位的风险。例如,上海市体育局对社会办训力量进行“过程投入”,通过扶持经费,帮助社会力量解决办训过程中的教练员问题、场地问题、参赛问题等,鼓励企业拓宽原本的经营思路,从单纯的培训类服务向

“培训+办训”相结合的复合型经营转变。同时,建立科学的竞技体育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明确未来收益分配预期,增强市场信心,形成“谁投资、谁受益”的良性循环。后期阶段,政府精准识别,加强竞技体育人才支持力度。对于经市场初步验证、展现出具备成为优秀运动员潜质的竞技体育人才,政府需采取行政介入方式,依托国家队梯队建设、优质教练团队配备、科技手段应用等公共资源进行重点投入,弥补市场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上的短期逐利性和信息盲目性。

第二,探索职业体育支撑奥运争光战略的制度设计。发挥职业体育对奥运争光战略的支撑作用,需突破体制壁垒,建构深度融合、互利共生的制度体系。一方面,健全职业联赛与三级训练网的协调机制。建立各级职业联赛与国家队、省队在运动表现数据、康复技术、科研攻关成果等方面的资源共享平台,国家队的技术、人力等资源可下沉至职业俱乐部,职业联赛以市场化竞争反哺国家队训练优化。另一方面,创新职业体育反哺青训的联动设计。职业俱乐部应按营收比例投入奥运战略项目青训体系,如设立定向青训基金、共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等,并将其纳入职业联赛准入评估中。

第三,搭建要素市场化交易平台,健全竞技体育市场交易机制。聚焦运动员转会权、赛事举办权、赛事转播权、无形资产开发等资源流转不畅、价值评估不清问题,加快建立竞技体育要素市场化交易平台。一是拓展国有体育产权和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市场化定价渠道。规范体育市场资产评价和估值程序,确保评估结果发挥应有的价格信号和激励作用。二是健全多层次交易机制。制定政策扶持和培育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建立、健全和发展,借助大数据建立赛事IP综合价值评估体系,完善成果转化定价流程和标准,解决要素“值多少钱”的难题。丰富体育市场交易方式,除挂牌竞价外,探索协议转让、招投标等方式,满足不同体育市场主体的差异化需求。三是强化体育市场交易监管。建立“政府部门—体育协会—第三方机构”联动的动态监管体系,严厉打击阴阳合同、恶意竞价等乱象,维护体育市场秩序。

3.3.2 “政府主导—市场配合”方式的实施策略

第一,优化财政资金投入方式,提升奥运战略项目发展效能。政府财政投入的精准性、引导性、有效

性直接影响着奥运战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加强财政资金投入精准化。改变过去竞技体育财政投入“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让每一分钱发挥更大实效、实现更高效益。坚持采用以政府投入为主、市场投入为辅的模式,依据不同运动项目国际竞争力、发展潜力及市场成熟度,建立分级分类财政投入标准体系。另一方面,强化财政资金投入方向性和利用有效性。为提高优势运动项目的竞争性,财政资金应重点投向关键技术攻关、高水平教练引进、青少年后备梯队建设、复合型保障团队搭建等决定项目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环节。同时,通过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引导市场资源有序参与赛事举办、运动员商业价值开发等环节,形成“政府保核心、市场拓外围”的协同发展格局。

第二,有序开展国家队商业权益补偿式运营,反哺夯实奥运争光保障基础。国家队商业权益的开发并非单纯逐利行为,而是形成以体养体的良性循环。首先,政府主导明晰权属边界。政府应明确界定可开发权益范围,包括名称、标识、肖像、非核心赛事冠名等,严防过度商业化侵蚀国家荣誉与队伍凝聚力。建立公开的招商模式、收益分配机制与合作伙伴筛选标准,确保商业权益开发过程规范有序,切实维护国家队形象与荣誉。其次,建立分类分层的授权体系。在政府的监管下引入专业第三方机构进行精细化运营,区分国家队整体品牌与具体运动项目队、明星运动员价值,科学设计分级授权体系。最后,健全收益强制反哺机制。完善透明规范的商业收益分配与监管机制,明确设定商业收益投入奥运保障的强制比例,并引入第三方审计与公众监督,促使商业收益有效提升训练科学性、保障系统性。

第三,推动竞技体育成果市场化共享,拓展资源配置效能转化空间。推动竞技体育成果向全民健身领域有序流动与共享,是实现体育强国建设“一体两翼”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是政府搭台,激活共享新动能。政府应加快推动竞技体育成果转化,系统梳理国家队训练方法、科研成果、康复方案、赛事IP等无形资产,明晰市场化开发与公益性开发边界。如探索将奥运冠军训练理念融入智能健身App与社区健身课程、将高水平赛事IP下沉为区域性群众赛事或体验活动等。二是市场运作,释放普惠效能。支持体育企业依据不同人群健身需求,开发多

层次、场景化的产品与服务。例如,作为运动科技领域企业,Keep通过更丰富的运动课程选择、更智能个性化的运动体验,真正降低了运动门槛,让运动不再受时间、精力、金钱限制,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运动健身群体,拓展了运动服务的边界。三是融合互促,形成良性循环。可将市场化运作收益的一定比例用来反哺竞技体育发展,形成有益的资金补充。同时,全民健身普及能扩大项目人口基数,为竞技体育发现和培养后备人才,提升社会关注与价值认同。

3.3.3 “政府兜底—市场自主”方式的实施策略

第一,完善多元参与奥运备战的制度设计。一是用好“全运会”杠杆,引导地方体育战略聚焦。从国家层面动态调整全运会设项,将市场基础薄弱且地方政府投入不足的项目(如垒球、橄榄球、棒球、手球等)纳入竞赛体系,并着重提高其奖牌权重与积分价值。利用地方政府对全运会成绩的积极追求,倒逼其加强该类项目的布局规划、梯队建设与资源倾斜,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项目发展合力。坚持全运会在竞赛规则和项目设置与奥运会全面接轨,完善整合奥运会、世界杯、世锦赛等国际大赛成绩的全运会综合评价机制,科学统筹国家战略与地方行动,充分体现奥运会成绩贡献等因素。二是强化资金保障,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实行以奖代补模式,将地方输送竞技体育人才质量、奥运贡献度与中央支持力度挂钩。支持地方利用税收优惠等手段吸引企业共建青训基地,拓宽资金来源,降低对中央转移支付的过度依赖,提升自主造血能力。

第二,优化项目资源布局,构建优势集聚、高效配置格局。其一,实施重点项目示范区建设。选择在特定奥运优势项目或潜力项目中基础好、意愿强、特色鲜明的地区,设立国家级重点项目示范区。中央赋予重点项目示范区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更大自主权,鼓励其先行先试探索“兜底—自主”方式的最佳实践。其二,大力推行“学校办”模式。支持具备条件的高校、体校,甚至优质中小学,经评估认证成为“奥运项目后备人才基地”,承担系统文化教育教育与专项训练双重任务。例如,靖远县体育运动学校获评国家曲棍球奥林匹克后备人才基地(2025—2028年),靖远四中和靖远五中作为中国曲棍球传统校,靖师附小教育集团和乌兰小学教育集团作为中国曲棍球推广校,构建起完善的曲棍球人才培养

梯队。此外,政府“兜底”提供场地建设补贴、教练员编制倾斜、跨区域招生政策及“学分互认”通道,破解学训矛盾。

3.3.4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方式的实施策略

第一,建立政府引导支持市场主体激励机制。首先,突破体育部门“独家办”封闭模式。依据项目特性和发展阶段,通过竞争选拔、联合共建、项目外包等途径引导市场主体承担国家队建设任务,真正实现“竞技体育大家办、竞争办”。其次,优化政策工具,降低市场主体参与风险。采取税收减免、贷款贴息、设立补偿基金等方式,有效降低市场主体前期投入成本与不确定性,解决“不敢投、不愿投”痛点。如温州市体育局联合财政、人社、教育等部门出台了《温州市兴办竞技体育训练机构扶持暂行办法》等政策,通过设立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奖补资金、赋予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教练员与体校等事业单位在职教练员同等权益等方式,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最后,聚焦体育市场主体培育与能力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针对不同类型竞技体育市场主体,提供差异化扶持。对于初创期体育俱乐部,侧重孵化支持,如场地优惠、人才培养补贴;对于成熟期体育企业,鼓励其发挥资金、技术、市场优势,牵头组建职业联盟或参与项目标准制定。

第二,健全商业化赛事体系,拓展项目市场价值转化空间。一方面,推动运动项目职业化水平。鼓励知名企业、俱乐部联盟等社会资本投资运营高水平职业联赛、俱乐部及训练基地。创新商业模式,如赛事IP开发、市场赞助、会员经济、跨界融合等,提升项目商业价值与“造血”能力。另一方面,培育壮大市场化办赛主体。当前我国主要由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均存在结构性缺陷,且两者间存在资源错配。因此,要加快完善部门协同机制,转变职能定位。从赛事主办者转向规则制定者与监管者,推动青少年体育赛事举办权的社会化转移与市场化运作,并通过政策扶持激励多元市场主体创办并可持续运营赛事。

第三,构建以市场为主体的奥运备战新模式。一方面,转变角色,强化战略引导。体育部门发挥“主心骨”作用,重在完善顶层设计、破除制度壁垒、搭建高效资源对接平台,并通过政策杠杆激发市场参与意愿,为社会力量“唱好戏”奠定坚实基础。另

一方面,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核心是广泛吸引职业俱乐部、企业、高校、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等多元主体,通过商业赞助、共建基地、科技研发外包、人才有偿输送、专业服务购买等方式深度嵌入奥运备战环节。利用优势互补,将市场的高效、灵活与举国体制的统筹、托底有机结合,提高应对国际体育竞赛的综合实力,实现奥运争光效能最大化。

4 结语

聚焦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还需要进一步转变竞技体育思想观念和发展方式,构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加开放的资源配置体系,为新型举国体制建设中资源配置难点破解提供创新路径。未来,竞技体育发展应坚持“开放办”总体思路,按照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机制建设要求,具体结合不同项目的目标任务属性和市场化程度,推动由国家投入为主向政府与市场多元投入方式转变,进而提升竞技体育发展的协同能力、社会活力、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 [1] 鲍明晓.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5,51(1): 6-11.
- [2] 杨国庆,彭国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回顾与展望[J].体育学研究,2018,1(5): 12-22.
- [3] TONE K. A slacks-based measure of efficiency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1, 130(3): 498-509.
- [4] PASTOR J T, LOVELL C A K. A global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Economics letters, 2005, 88(2): 266-271.
- [5] 吴昊玥,孟越,黄瀚蛟,等.中国耕地低碳利用绩效测算与时空分异[J].自然资源学报,2022,37(5): 1148-1163.
- [6] 宋吉涛,赵晖,陆军,等.基于投入产出理论的城市群产业空间联系[J].地理科学进展,2009,28(6): 932-943.
- [7] 张凤彪.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竞技体育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研究——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证分析[J].体育科学,2015,35(2): 31-40.
- [8] 袁凌峰.“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我国省级体育公共财政投入效益研究[J].体育科学,2022,42(5): 38-46.
- [9] 韩松,周克男,刘思语.我国竞技体育财政支持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4,47(2): 10-24.
- [10] 张俊珍,许治平,郭伟,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竞技体育资源配置与利用的实证研究[J].体育学研究,2020,

- 34(4): 63-71.
- [11] 邹月辉, 田思. 基于动态 DEA-SBM 模型的社会保障对竞技体育投入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0, 54(10): 50-57.
- [12] 王禹, 张凤彪, 闵航, 等. 我国省际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J]. 体育学研究, 2023, 37(5): 89-105.
- [13] 张尚权. 体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及其评价[J]. 体育科学, 1992(2): 4-6.
- [14] 彭国强. 新型举国体制下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机制改革: 形势、困境与路径[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4, 41(5): 605-614.
- [15] 王会宗. 行政垄断下我国竞技体育行业效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7, 51(8): 27-34.
- [16] 杨国庆. 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困囿与纾解方略[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2, 46(1): 1-9.
- [17] 张瑞林, 樊正洋. 新型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观的理论审视与实践路向[J]. 体育文化导刊, 2025(6): 1-8.
- [18] 马德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演进历程与展望[J]. 中国体育科技, 2021, 57(1): 4-11.
- [19] 鲍明晓. 构建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新机制[J]. 体育科学, 2018, 38(10): 3-11.
- [20] 黄海燕, 曾鑫峰, 冯珺. 进一步深化体育改革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建立与完善体育领域市场机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5, 48(1): 1-13.
- [21] 王志文, 王先亮. 我国地方性单项体育协会分类治理的模式建构与实践侧重[J]. 体育科学, 2023, 43(12): 87-93.
- [22] 辜德宏.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的作用及优化策略研究[J]. 体育科学, 2022, 42(2): 12-20.

作者贡献声明:

张瑞林: 提出选题, 设计框架, 撰写论文; 王志文, 王禹: 撰写、修改论文。

The Efficiency Dilemma and Reform Path of Competitive Sports Resource Alloc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ZHANG Ruilin, WANG Yu, WANG Zhiwe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and adjustment of resource allocation directly determine the consolidation of advantages and the resolution of bottlenecks in China's competitive sports industry. The non expected output super efficiency SBM model using global reference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competitive sports resource allocation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2,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overall efficiency level was not high and the growth rate was slow.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and expert interview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fficiency dilemma of the alloc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resources in China,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ecreasing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led allocation and the insufficient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s in the alloc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resources. Based on this, design a classification reform approach for the alloc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resource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and propose diversified investment methods for sports projects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task attributes and marketization level of different projects. For projects that bring glory to the country and have a sufficient market, choose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For projects that bring glory to the country but are weak in the market, choose a government led market cooperation approach; For routine targets-weak market projects, choose the government's fallback-market autonomy approach; For the conventional goal of market sufficient projects, choose the government guided market operation mode and propose targete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sports powerhouse;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competitive sports; resource allocation; sports events